

我的北大日子 / 唐亦曾

小事物的精英 / 西川

谁敢不娶北大女生 / 格魔

之楼(上) / 孔庆东

十年一觉 / 陈平原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 蔡恒平

穿越冰山 / 橡子

北大啊北大 / 迟子建

「珍藏版」

北大往事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二〇周年

橡子 谷行 主编



〔珍藏版〕

北大往事

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往事(珍藏版)/橡子,谷行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28-671-9

I. 北… II. ①橡…②谷… III. 北京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255 号

北 大 往 事 (珍 藏 版)

主 编:橡 子 谷 行

责任编辑:钟振奋 刘丽刚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22

印 数:1~1500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671-9

定 价:36.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70年代

- 北大杂忆·岑献青……3
一个口号的诞生·刘志达……13
漫忆七八·马相武……17
闲话北大·赵园……27
贫穷而且精彩·吴晔……30
我的北大圈子·唐师曾……37
阿毛逸事·王惠民……40
人事两茫茫·周立文……44
海子的毕业留言·刘广安……47
燕南园的身影·程丹梅……49

80年代

- 谁敢不娶北大女生·格鹰……55
小事物的精英·西川……62
孤征·王开林……71
找不着北大·张华峰……74
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晓钟……78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张璨……86
文八二、434 及其他·王川……96
怀念故人·阿忆……111
诗歌的联系·麦芒……119
47 楼 207·孔庆东……124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蔡恒平……135
“小平您好”和我·徐小平……143
十年一觉·陈平原……148
记忆的诱惑·王枫……151
师事·天波……160
诗歌与骚动·郁文……164

生命与学术·王岳川·····	168
燕园学诗琐忆·西渡·····	178
谁比谁活得更长·杜丽·····	192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杜丽·····	198
想念王毅·余世存·····	201
穿越冰山·橡子·····	205
吹尽狂沙始到金·橡子·····	223
北大混史·蒙夫·····	228
怪斋笔记·雷格·····	232
黑蝴蝶吃语·姚丹·····	236
文人之初·李方·····	241
向死而生·周阅·····	247
放逐爱情·潘多拉·····	252
爱留痕迹·晓白·····	261
最后的八十年代·彭蓉·····	271

90年代

虚构的北大·胡续冬·····	287
球人球事·季晟康·····	290
青春在右爱在左·张菁·····	295
北大周围的小饭店·郑勇·····	301
与飞翔有关·刘煜·····	305
北大啊北大·迟宇宙·····	310
噬菌体·叶宁·····	322
永不落幕的戏·王润·····	334
新版后记·····	347

那叫我们痛苦的大海是深沉莫测的……
我们又划着我们的断桨出发了。



70年代

北大杂忆

岑献青

一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年底考试，第二年2月就入学。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以一种迫不及待的速度重新开始。而北京大学，也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除的主人，匆匆忙忙地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新生。校园里满目都是那场革命遗留下来的痕迹，标语纸、大字报纸还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抖动。

学生宿舍也没有调整好，32楼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同时也是办公室所在地，办公室占了二层，一、三层是男生宿舍，女生则住在四层。

到北大后没几天，就下了一场雪。雪不大，但飘飘洒洒的，很令我这个来自边地的广西人惊讶和感动。于是我拎起热水瓶，告诉同屋的同学说：“我要下楼打水去了。”

其实是想去看雪。

直到二十年后，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有人拿这事当笑话说。

那个时候，我的样子一定像个村姑。

实际上，我想看的何止是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所看到的，又何止是雪？

多少年来，常常有一个晨曦中的背影在我的记忆中浮现，那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生，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悄悄地搬了一张凳子，在楼道的窗下读书，不只是读外语，还读别的教科书，甚至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史料也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我们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她居然把“四渡赤水”讲得明明白白，像是她自己渡了四次赤水似的，让我惊讶不已。

实际上，这样的背影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这样的背影都会出现在未名湖边的石堤上、图书馆前的草坪里、教学楼旁的迎春花树下、山坡树林的石砌曲径中……这样读书的学生，大约也是北大校史上最特别的一届了，年纪最大的与年纪最小的同学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

已经当了父母，有的人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当历史给了他们一个进入北大的机会时，一种生命的紧迫感便骤然而至，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也都恨不得把他们的知识在一夜间就都教给我们，每一堂课的内容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还开了许多新的专题讲座。我们真算得上是有福分的学生。在读本科时，有幸拜访过当年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杨晦先生，聆听过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阴法鲁、陈贻焮等等老先生的课。而在当时还算得上“中年教师”的金开诚、袁行霈、吕乃岩、费振刚、何九盈、孙玉石、谢冕、乐黛云、周强、周先慎等先生，不仅给我们讲课，还常常在课余时间到我们的宿舍来给同学们解疑或是和同学们聊天。我们也经常请老师们参加班里的各种活动，或者在课余三个五个地结伴上老师家请教。与老师们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那样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化的浸濡，一种心灵的沟通，一种精神的传递。师生间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和谐融洽的关系。袁行霈先生曾经很动情地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在我们毕业十五年后，孙玉石先生为我们班郭小聪的书《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们为了吮吸人类知识宝库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古老的和新鲜的营养，天天钻图书馆，购买和传阅每一本新出的书，讨论和争吵一些学术问题，为了听课，尽早地等在教室门口，抢位子，为此甚至挤碎了门玻璃；他们默默地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图书馆中，勤奋地爬格子，匆忙地涂写，各自做着人生前行的美丽的梦。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而周先慎先生在十几年后见到我，还会提起当初他给我们上课时，同学们总是为他准备好一暖瓶水，并且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事情。

来北大前，我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二十年，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我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外婆，还有一个在国民党伪县府任过职、又在“四清”运动初期不明不白地上吊自杀的伯父。在我三岁时，母亲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这些林林总总的关系，使我们的家庭罩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阴影。“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又成了走资派，常常被揪斗、囚禁；当我拎着饭盒去给

父亲送饭，走过那些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的造反派面前时，心里总有一种极端的恐惧。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生存状态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当我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母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当我带着这样一种经历来到北大时，我却发现我的这些所谓苦难，与许多人相比，其实真算不上什么，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戴过右派帽子，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差不多人人都在农村插过队，在矿山干过活，在南北兵团里“战天斗地”，他们经历了生活的苦难，更经历了心灵上的苦寂和孤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了辛酸血泪的故事。同样的，我们的老师们，也在时时都处于政治中心的北大遭受了我们难以晓喻的心灵苦难。

但是，在那个时代，承受了最大苦难的却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北大使我学会了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阅读苦难，认识苦难，理解苦难。

也许正因为经历过这些，我们才会一百倍、一千倍地珍惜读书的机会，没有人一味地躲在角落里舔伤口，也没有人终日都在絮絮叨叨地诉说过去，我们都认为民族的振兴将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什么。这毕竟是带着一种特殊历史背景进入北大的学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沙漠的痛苦，那种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那种拼命读书的“疯狂”劲头，恐怕是现在的学生很难想像得出的。

二

当然也不是死读书，除了上课，我们还有许多有滋有味的课外活动。

我们班的同学中，有好些在上大学前就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进了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自然更是跃跃欲试，要圆一个作家梦。尽管系里的老师一再强调“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大家还是不愿放弃这个梦想。于是便有同学张罗着成立起文学社。

许多年后，黄子平在为我的散文集作序时，这么写道：“……那是个被后来确认为‘思想解放’的年头。大学里又可以办学生社团了，最活跃的当然又是中文系了。班上的一些同学不少在入学前就发表过作品的，自然手痒难耐，先是组了一个‘早晨文学社’，下分小说组、诗歌组和评论组。其中小说组阵容最是雄壮，有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陈建功，还有黄蓓佳、王小平、小楂等几员女将，岑献青也不声不响地跻身其中。我因为写过几首如今读来‘愚

不可及’的诗而入了诗歌组，大约是曾在花城出版社当过几个月‘借用编辑’的缘故，被推了当油印文学‘刊物’《早晨》的‘主编’，便也偶尔参加小说组的活动。其时写小说的人还时兴‘谈构思’，小说组的活动是各人在那里大谈其构思，然后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出主意甚至‘转让’细节之类。要数陈建功最热衷于‘谈构思’，不管是去饭堂还是课堂的路上，他逮住你就开始‘展开’他的构思，而且这构思一天三变，又不厌其烦地与你讨论，待到这作品发表出来，全班人几乎都已‘耳熟能详’了。别的一些人却苦于没法‘谈构思’，都说到底什么样儿只有写了出来自己才知道，……于是又有写出来的小说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眼见为实，果然谈不出构思来的也能写出好小说。……”

即便是这么地“大谈特谈”，也不过瘾，便又在32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用稿纸抄了我们的“作品”张贴在上面。那真是当时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每逢吃饭时间，32楼前就挤了很多端着饭碗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

油印刊物自然是自己动手，找了钢板、蜡纸、刻笔、油印机，就在宿舍里“开工”，常常是废寝忘食，干得很来劲。依然用“早晨”作刊名。装订好后，分送给同学老师，还寄到外地的大学中文系“交流”，似乎还真造出点“轰动效应”来，时不时的还有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同学“上门拜访”。

当然，办刊的经费是自筹，那时没有拉赞助一说，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有时也鼓起勇气在三角地叫卖，找回一点工本钱来。但也有同学能出歪点子的，比如在帮着学生会往30楼里搬运办公用品时，悄悄地扛了一大筒纸就往宿舍跑，学生会的人发现了，急得大喊：“走错了走错了！”扛纸卷的人便做出悻悻的样子转回来。只是学生会的人想不到中了我们的“调虎离山”计，在他以为捉住了“作弊者”的时候，早已有人又扛了一筒纸隐进了32楼的后门。

于是下一期的《早晨》便能如期出刊了。

北大“文革”后的校园文学也许可以说是从《早晨》开始的，在它的基础上，以中文系文学专业为主，扩展到全校的文学爱好者，成立了“五四文学社”，并创办了社刊《未名湖》。我的一篇习作《阿盛》居然上了创刊号，令我对这份刊物多了一分亲近。

到北大后的第二个学期，中文系男女生宿舍分开，女生搬到31楼，生活上自然就方便多了。可另一些不方便的事又来了。譬如班级开个会，通知个事，当班干部的就要来回跑。入学后第一个新年要开文艺晚会，各班都在排

练节目。我们班的男生要表演小合唱，歌名叫《山药蛋》。主持排练的班干部是女生，连拉带哄地把男生都叫到31楼来。于是那些天，常常就有一群男生在我们宿舍门前排了队扯起参差不齐的嗓门大吼：“山药蛋那个呀嗨嘿……”惹得别班的女生都从门里探出脑袋来或聚在楼道另一头远远地看，掩了嘴笑。一笑，小伙子们的声音就低了，让人听着就像那些“呀嗨嘿”的山药蛋堵在了嗓子眼里。

北大的舞会也是自我们班始兴起的。第一次在学校一起跳集体舞，还是被学生会动员去的。“文革”十几年中，没有人敢跳舞，现在忽然说要恢复了，就像一件很不得了的大事，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很紧张很严肃很认真的态度和姿势来“操练”。不少留学生也前来观看和拍照。后来集体舞不再有人跳了，取而代之的是交谊舞、探戈什么的，于是31楼里陌生男孩的面孔也渐渐地多了。人们都说中文系女生有几位“舞星”，又漂亮又优雅，常常就有外系勇敢的男孩子来相邀。记得有一个长得很秀气的男生总在星期六的傍晚出现在31楼，见了女生就问：“可以请你去跳舞么？”

北大曾经使我敬畏。从前在煤矿时，我看过关于北大学生“批林批孔”的纪录片，电影里的北大学生一个个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令我们惊叹不已。如今，我居然到了从前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读书，听那些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讲课，跟一批又聪明又有才气的人做同学，那种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我很明白，自己学业的基础比别人不知差了多少，见识比别人不知少了多少，且不说能不能“滔滔不绝”，就我那一口“南蛮舌”，都能把人给听得云遮雾罩的。有一回到食堂买饭，我说要半个馒头，大师傅拿起串馒头的铁钎，刷刷地给我串起八个馒头来。等到又有一次，我要买八个馒头时，大师傅却不高兴地说：“我不卖半个！”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和歧视，北大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只要你自信、努力，你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人。

实际上，我那时感觉到更多的，还是来自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学习上自不必说了，生活上也总是处处得到关照。我因从前在煤矿工作时落下胃病，来北京后饮食不适，犯得很厉害，班主任张剑福先生便将他的煤油炉给我拿来，让我煮面条吃。每每到了晚饭时候，楼道里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油味，这味儿不好闻，可班上的女生都很体谅，没人说什么。倒是常常在吃过饭后上图书馆时，总有人吸溜着鼻子四下张望：“怎么会有煤油味？”

后来又有同学拿了电炉来，很小，才三百瓦，但可以烤烤馒头，热热剩饭，大冬天实在太冷，还可以取取暖。

但总要提心吊胆，明知道是违反校规的。偶尔来了查电炉的人，就像发现“鬼子进庄了”，各个宿舍都互相通报，只差没有立起“消息树”了。不过，查电炉的人也不傻，有一回就用了从前地下党工作的方法，伪装成送校刊的人，腋下夹了一摞报纸，一头就闯进我们宿舍。恰恰那天晚上一群女生正聚在一起聊天，烧着电炉烤火。一时间我们真是无地自容，乖乖地拔下插头，听候发落。

查电炉的是行政处的工人，大约五十岁的年纪，十分严肃地拎起电线，晃着电炉，逐个地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做贼心虚”！

工人师傅说：“谁的电炉？”

谁也不说话。工人师傅又说：“不说话就都跟我走一趟！”

一听这口气，我马上说：“是我的。”虽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用，可我是班长，这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总要落到我头上的，何况我也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工人师傅说：“写上名字！”说完把电炉握在手里。不料电炉还很烫，他一缩手，炉盘就跌在地上摔成了几瓣。

有人忍不住“扑哧”笑起来，立刻又掩了口。师傅似乎尴尬了一下，又很认真地递过来，于是我也很认真地忍了笑往那块最大的碎片上写我的名字。

师傅却皱起眉说：“怎么会有这个姓？姓 ling 么？”

这时有位女生说了：“师傅你不知道呀？这是少数民族的姓！您别以为我们成心犯校规，小岑是从中越边境来的，好几千里地呢。来到北京吃不惯食堂的饭，得了挺重的胃病，我们才凑钱给她买了这个电炉的。”

别的女生也都像突然醒悟了似的，这个说师傅您不知道，她这几年喝的中药比吃的饭还多，咱不帮她，谁来帮？那个说，师傅您看，反正这电炉也摔了，交上去学校也没什么用，您何不当个好人，给她落实一回民族政策？您若非要罚款，怕是精神物质两个负担压下来，保不定小岑就要闹个胃穿孔什么的，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呵！

说话的都十分动感情。我先是觉得好笑，后来渐渐地就觉得自己真像是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居然就有了泪水在眼里打转转。

果真就感化了那位师傅，他叹了一口气说，饶你一回就是。

大家就欢呼，给那位师傅又说了许多好话，令他眉开眼笑。

等他一走，我们便搂在一块儿笑，我把几个女生乱捶了一通。电炉是大家用的，这位烤馒头，那位煎鸡蛋，取暖时都凑在一堆，那几双手又不全长

在我身上，怎么说来说去就该我“后果自负”了？

胡乱打闹一气后，静下来再细细地想，又兀自感动得直想掉泪。那个时候，我确实喝了近二百服中药（当然都是学校药房代煎），胃病折腾得我十分痛苦，那时不像现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合适的饮食，要不我也不会去弄那些什么煤炉电炉的，成天只能吃些讨厌的烂面条。

如今毕业十几年了，每每想到当时同学们对我如此关切，依然感动如初。

三

我从北大毕业后，单位在沙滩北街2号的老灰楼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到了那里，才知道老灰楼居然是旧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

突然就有了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像是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已不再是北大宿舍了。

老灰楼像个缺了一笔的“口”字，呈“匚”形，空着的那一笔据说早先是围墙。这个“匚”形，其实是三幢连在一起的楼，共有八个门，从“匚”的右下角起，依次称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恰恰是《千字文》的头两句。为什么如此称谓，一直不得其解。倒是听说当年老灰楼建成这样的格局，是为了便于控制学生的活动。因为这八个门中，只有“天”字门和“荒”字门是通达院内外的，其他门里出来的人，都须经过这两个门。这么说来，一旦学生们聚众闹事，当局就可以很严密地快速地堵住门了。听归听，并不当真，总觉得不过是“民间传说”。但有一回见到读书时认识的一位先生，听说我住在老灰楼，就说起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曾因特务盯梢而躲进老灰楼的故事。方知在从前，确实是有“白色恐怖”的了。

由此又不禁对当年的北大学生生出一种崇敬来。

老灰楼的南边是从前北大的广场，著名的五四运动发源地。1947年华北学联将这块地方命名为“民主广场”。只是现在广场已经不“广”，那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易楼房，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办公处。据说有关部门再三强调这里是文物保护重点，所有单位必须迁出，但中国作协当时苦于无处可迁，死活不动，有关部门也奈何不得。

老灰楼的西侧还有几栋灰砖大屋顶楼房，其中一座是北大从前的图书馆。我在那里借过几回书。大约因为屋子大、天花板高的缘故，感觉很空落也很幽静，是个读书的好去处。大约当年毛泽东做北大图书馆馆员时，就是在这里拿薪水的。

北大广场的西边，是个叫做“西斋”的地方，与景山公园东门隔路相望。当初单位分配住房时，曾问过我愿不愿住西斋，因为听说是平房，我这个南方人不会侍弄冬日的煤炉，就仍住在老灰楼。后来才知道那里最早还是乾隆帝四女和嘉公主的府第。光绪帝当年在维新派推动下，接受康、梁的变法主张，就在这里开办了京师大学堂，直至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始改为北京大学。

改成北大后，西斋曾作过女生寄宿舍，稍早些还是文科的讲堂和教员的预备室，许多名人每日都在那里聚集，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胡适、周作人等等。但这些历史从前却不甚知，直至1990年北京市政府文物管理局在此处设下“京师大学堂”的牌子后，方知这片现在看起来十分杂乱的院落还曾如此辉煌过。于是有些遗憾起来：若当初住了西斋，说不定会在梦中会会那些老前辈呐。

有时想想也觉得有趣，我怎么一个跟头似的，又折回京师大学堂了呢？

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却与现在住老灰楼、西斋一带的人无甚干系。我在老灰楼住着，左邻右舍都是机关的干部或工厂的工人。白日人们上了班，就有好些小保姆在院子里带着小小的孩子聊天，还有些老太太拎了篮子出门买菜，相互见了面就大声地说着东家长西家短。

这一番很世俗化的生活场景，像是将北大历史上那壮丽的一页完完全全地翻了过去，而那些关于北大学生的故事，愈来愈淡地退到了后台。

即便如此，在老灰楼里住了好几年，总觉得自己依然是北大的学生，不过是换了个宿舍罢了。

四

几年后，我又住进了北大校园。丈夫在中文系做教师，我再一次住进北大，就不再是“学子”而是“家属”了。

先是住在校南门附近的21楼。从前做学生时，对这个楼就很熟悉，因为班主任就住在这里，好些教我们课的老师也住在这里。“文革”刚结束时，百业待兴，学校住房十分紧张，老师们的居住条件实在寒碜得很，真正的陋舍，常常是一家三四口住一间十平方米宿舍。记得金开诚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说自己当初住21楼时，如何趴在床沿上写作，用书时就往床底下一伸手，拉出一箱书来。

金开诚先生的夫人屈育德先生教我们民间文学课，她是钟敬文先生的高

足。屈先生一生坎坷沧桑，身患绝症，在这样的陋室里，拖着术后虚弱的身体，既做良母又做贤妻，还以惊人的毅力备课和著述。每次听她用术后变得含糊的声音艰难地讲课，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难过。我的毕业论文是民间文学选题，虽不是屈先生指导，她却十分关注和欣喜。我临毕业时，她曾希望我到民研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遗憾的是分配方案中没有民研会，终于未能遂了先生的意愿。而我毕业后又因了种种原因，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做起文学编辑来。如今先生已长眠九泉之下，每每忆及，总有愧疚之感。

我们在21楼住的房间极局促，十一平方米的房间，其中有一个角落还堆放着一位出国教师的家具和书籍。屋里完全是学生宿舍式的安排，面对面两张小床，丈夫用一张，我带着儿子用一张。床太窄，就加了一排方凳。两床中间夹一张书桌。床既是床也是坐凳，书桌既是书桌也是餐桌。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在屋里没有空处玩，就只好上床盘腿坐着玩。丈夫当班主任，学生晚上来家开班委会时，我和儿子就“列席”，因为无处可逃。

幸好两年后就有了—次调房的机会。1988年夏天，我从长白山开会回到21楼，发现他们父子俩和一整个家都不见了。隔壁的教师说，都搬到畅春园了。我急急地赶了去，果然就看到他们俩在一间颇宽敞的房子里吃饭，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什几乎将他们埋了起来。半间房的地面上，撒满了儿子的玩具。丈夫说，儿子不叫收拾！好不容易有一块地方让他随心所欲地玩一玩了，想想也真不忍心收拾了。我这么—看，这么—听，眼泪差点儿就落下来。其实这里仍然是个筒子楼，公用厨房公用厕所，丝毫没有一点“居家”的意思，怎么琢磨怎么像学生宿舍。

又两年后，搬到了中关村506楼，—居室房子，还是窘迫，我与儿子共用的书桌便安放在阳台上。如今却又是在蔚秀园里写这篇文章了。虽说住房状况在—点—点地好转，但依然有成捆的书堆在地上，塞在床底下，我仍然与儿子共用—张书桌，当他从学校回来后，我便只好趴在床上工作，或者下厨房。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唠叨在北大的居家琐事，只是想说，我们这十几年来，其实正是沿着我们的老师们当年居家的轨迹走了一遍，将我们的老师们所体验过的艰难困窘也体验了一遍的。有人借用孟郊的诗句来描述北大教师搬家的情景：“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说的是有—位青年教师用三轮车搬家，惟—的电器是—台电风扇。这其实几乎是每个北大教师最早的居家情景的描写。

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的青年教师住在我们当年住过的筒子楼里，也许在不短的时间里，他们也还不得不步我们的“后尘”。

我常常因此想到，北大有着怎样的一种魅力呵，竟然能使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如此淡泊享受和名利，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这样的精神家园中，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这一方土地上！

也许，谢冕先生的一段话才是最好的回答：“这里从来都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且从来都是通过这种集聚，唤起他们对于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四周弥漫着世俗习气的环境里，这里的清静和高雅，很像是一座孤岛。中国因有这样一些孤岛的存在而深感骄傲。它一定会像这学校在历次重大的转折关头所曾经做过的那样，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浮嚣肤浅之风不可学；里面的世界也许很无奈，但精神高地上的太阳更明亮，空气更新鲜，视野也会更开阔。”

1993年夏天，我在自己的中篇小说集自序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北京大学，这座神圣的殿堂，以她坚实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并以她伟大的永恒的魅力征服了我。四年以后，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北大使我站在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审视人生认识人生……”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如今来写关于北大的文字，我却不知该写些什么好，因为我实在说不清楚在哪一天，或者因为哪一件事，使我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但确实实地，在读完了四年大学后，我真的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入北大前的自己了。

我相信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写下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后，我明白我再不可能用语言来描述这种获得新生的过程了，就像细细的春雨飘洒向大地，你几乎还没感觉到什么，不知怎么的，就有新芽从泥土里拱出来了。

我常常在想：我一个壮族女孩子，怎么就从几千里外的边地来到北大这座圣殿，并从此与北大结下了一份撕扯不断的缘呢？

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岑献青：女，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2年1月毕业。现为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